



THE ROAD TO REVIVAL

——百年中国教科书与社会变革

吴小鸥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ROAD TO REVIVAL

——百年中国教科书与社会变革

吴小鸥◎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兴之路：百年中国教科书与社会变革 / 吴小鸥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0
ISBN 978 - 7 - 5161 - 6971 - 1

I. ①复… II. ①吴… III. ①教材 - 研究 - 中国 - 近现代
IV. ①G423.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113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王 影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47 千字
定 价 7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复兴之路——百年中国教科书启蒙与社会变迁研究”（编号：10YJA880147）的成果

教科书是时代启蒙的种子（代序）

鸦片战争以前，没有近代的普通学校，只有进行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初学《三字经》《百家姓》，进而读四书五经，不存在现代学校所备的教科书。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发达的科技和昌盛的物质文明中，深感自身的贫穷和落后，从西方自由平等思想和民主制度的盛行中，看到了千年封建社会的流弊。“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①而兴办教育“全以教科书为胜败”。^②于是，近代历史重大的变革关头，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刻不容缓的神圣伟大使命。百余年来，中小学教科书发展经历过艰难的移植、激烈的碰撞及其更多别具匠心的创造。从《国文》到《国语》到《语文》、从《修身》到《公民》到《思想品德》、从《格致》到《理科》到《科学》、从《唱歌》到《音乐》到《艺术》、从《体操》到《体育》到《健康》……“人民”“文明”“科学”“民主”“自由”“议会”“法律”“电报”“电话”“留声机”“显微镜”“交易所”“托拉斯”“银行”“证券”“图书馆”“博览会”“因特网”等直接反映现代社会文明成果的新名词大量涌现……穿越岁月的风雨、动荡、喧嚣与浮华，这些教科书以相对凝定的视角，承载着不同时代的希望与梦想，有目的地传承和嬗递不同价值取向的知识，标示出对特定生活世界的文化的深邃反省、思索和忠实记录。“如今，

①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6，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2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赵尔巽档，胶片号9，拍摄顺序号2，卷54。

翻天覆地的变革虽已过去，遗存的教科书却述说着不可磨灭的意义。”^①

“启蒙”一词最早见于《风俗通·皇霸·六国》，“海辄挫恤，亦足以祛蔽启蒙矣”。^②其中“启”是开的意思。^③而“蒙”，至少有三种意思：其一，蒙骗，与“实”相对^④；其二，蒙昧、无知^⑤；其三，通朦，眼失明。^⑥启蒙是指启迪和教育童蒙，消除蒙蔽，恢复光明。“启蒙”一词在英文中是 enlighten，在德语中是 aufklaren，在法语中是 luire。它们的中心词根皆为“光”“照亮”，一般指传递知识，使人从无知变为有知。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的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⑦教科书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实施的最主要载体，以其知识的规范化、系统化特征，扮演了主导启蒙的角色，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整体素质提高及社会文明进步。一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到底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究竟怎样实现从沉沦到复兴的伟业，一本本教科书述说不同时代一些行将远去的信息、一些昭示和影响了后人的言行和思想，展示一代又一代人不同的人生理想及时代希望。

① 石鸥、吴小鸥编著：《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1897—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② （汉）应劭：《风俗通·皇霸·六国》。

③ 《说文·口部》：“启，开也。”

④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邾氏、费氏自以为王，专祸楚国，弱寡王室，蒙王与令尹以自利也。”杜预注：“蒙，欺也。”（宋）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

⑤ 《易·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孔疏：“蒙者，微昧暗弱之名。”《素问·举痛论》：“令验于已而发蒙解惑，可得而闻乎？”（清）王夫子《张子正蒙注序论》：“蒙者，知之始也。”

⑥ （唐）刘禹锡：《赠眼医波罗门僧》：“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⑦ [德]伊曼努尔·康德：《历史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1840—1926 年：新式教科书以“科学” 为核心的启蒙引领救亡图存

经由 1840 年鸦片战争，至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 年八国联军侵华等重大历史变故，一个庞大的东方封建帝国体系轰然分崩离析。在 20 世纪的曙光中，梁启超大声疾呼：“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① 伴随着 1902 年《钦定学堂章程》及 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实施，中国建立了现代教育制度。1903 年，文明书局开始高举“科学”大旗，出版“蒙学科学全书”28 种，是第一次全部印有“教科书”字样、第一套中国人自己分科编著（译）、至今唯一用“科学”之名统领的教科书。^② 1903 年，商务印书馆推出蕴含全新科学内容的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教科书“最新教科书”75 种 149 册^③，以其全新价值预设以及具有历史进步方向性的洞察力，在清王朝三百年江山气数将尽时，为灾难深重的民族开启全新的启蒙。

当少年学子们手捧全新的《修身》《国文》《格致》《理科》《中国历史》《万国地理》《生理学》《博物学》《声学》《力学》……琅琅书声中，1905 年科举制废除、1906 年《强迫教育章程》颁布、1907 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颁布、1910 年《简易识字学塾章程》颁布，中国教育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变革。面对教科书巨大的需求，普通学书室、彪蒙书室、会文学社、科学书局、科学会编译部、科学仪器馆、清国留学生会馆、群益书社、新学会社、广智书局、作新社、国学保存会、中国图书公

① 梁启超：《少年中国之少年》，《清议报》第 35 册，1900 年 2 月 10 日。

② 吴小鸥、李想：《“蒙学科学全书”与 20 世纪初的科学启蒙》，《教育学报》2012 年第 5 期。

③ 吴小鸥：《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9 页。

司、集成图书公司、开明书店、达文社、群学社、时中书局、乐群书局、普及书局、昌明公司、东亚公司等书坊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其编撰出版的教科书为幽暗时空的中国社会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于是，在启蒙和救亡成为中国社会两大主题时，教科书承载的科学启蒙力量，引领并实现着救亡。

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其空前的伟大意义在于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的新政权。这一年，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实施了初等小学男女同校，这一年的小学教科书从开篇大写“人”到内容明确“国家基础，在少年教育”^①，教科书在革故鼎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开风气之先，以全新的文化标准展现了一个时代对于“中华”对于“共和国”对于“公民”的殷切期望。于是，民间书坊争先恐后编撰出版“中华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制教科书”“新式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普通教科书”“新法教科书”“新体教科书”“新教育教科书”“新教材教科书”……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教科书编撰出版中，以欧美留学生为主导力量的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开拓进取地展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自信与创新运动，《修身》改为《社会》或《公民》，《国文》改为《国语》《作文》《国文》，《理科》改为《常识》《自然》，《体操》改为《体育》，《唱歌》改为《音乐》，《图画》改为《公用艺术》《形象艺术》，还有全新的《社会问题》《人生地理》《人生哲学》《自然科学》《科学方法》《公民生物》《医学常识》《论理学》《心理学》……教科书以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在凝聚海洋文化视域与寄托中形成对一种特定历史境遇的介入，也迎来自身发展的鼎盛时期。

从1903年至1923年前后，中国现代意义教科书呈现“黄金二十年”的发展态势，教科书的范围从普通教育到女子教育以及社会教育，迅速普及与推广；教科书的种类从少数几门到纷繁复杂，学科门类不断尝试建构、调整与更新；教科书的编制从直线式到圆周式、从课后设问到课前及课后均设问，从无单元设计到有单元设计再到大单元设计、混合编制，力求在符合儿童认知及学习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建构知识；教科书的插图从单幅到多幅、从黑白到彩色、从绘画到照片、从静止到连续动作，尽可能引

^① 沈颐、戴克敦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等小学春季始业第8册），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版，1913年59版，第6页。

发儿童的兴趣及满足直观教学的需求。教科书的内容选择从学科知识到生活主题，教科书的语言从文言到白话、注音符号，教科书的标点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中小学教科书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引领下，构筑了中华民族生机勃勃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生态。如今，人们追怀老清华、老北大以及西南联大，追怀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时，或许要知道，这是与“黄金二十年”优良的中小学教科书启蒙密不可分的。这些教科书在中国政局陷入混乱之时，成功为中国教育乃至中华民族确立起不拔的根基。正如胡适先生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人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①

1927—1949年：国统区教科书以“三民主义” 为宗旨的启蒙引领共赴国难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提出“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②，期望“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实行三民主义，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③他看见五四运动青年学生不同寻常的力量，希望“使全国学生皆集于革命旗帜之下，努力进行，果然能够百折不回，则革命成功”。^④1926年2月，广州特别市党部青年部通告“鉴于全市高级小学以上学校，自春季入学开始，要增设三民主义一科”。^⑤广东国民革命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明确要求“一切教育措施皆依三民主义之精

①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张君勱、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②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7页。

③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4页。

④ 同上书，第113—119页。

⑤ 熊秋良：《从政治动员的角度看国民党改组后的“党化教育”》，《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神，对于各级教育尽量灌输以党义，称之为‘党化教育’”。^①5月，广东全省第六次教育大会通过《党化教育决议案》，“确定教育宗旨为平民化与革命化之教育；……规定三民主义为必修课，……此后新编教科书，应以中国国民党的党义和政策为中心”。^②

1927年5月，蒋介石发出全国实行“党化教育”的号召。^③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学校实行党化教育办法草案》，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根据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我们应赶促审查和编著教科用的图书，使与党义和教育宗旨适合。”^④1927年，各书坊推出“新时代教科书”“新主义教科书”“新中华教科书”等党化教育背景下的新教科书，如小学教科书明确指出：“中国国民党是现代中国社会环境中的产物，是适合社会的进化法则而生的产物，且负改造中国的责任。我们相信要养成适合于改造中国的人才，惟有以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做训练的标准。故本书采用中国国民党的党义编辑，以期切合三民主义教育的主张。”^⑤1928年2月，大学院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之外，增设三民主义科。1928年8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通则》，增设“党义”科。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暂行课程标准》，取消“公民”科，以党义科代之。在以“三民主义”和“党义”命名的教科书开篇及插图中，突出“孙中山”形象及“国旗”“党旗”符号标志，采用故事浅说、原著节录等突出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政治认知。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案。1931年6月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① 陈进金：《抗战前教育政策之研究》，近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② 《全省教育大会通过党化教育决议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5月10日。

③ 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6页。

④ 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28年版，第8—9页。

⑤ 魏冰心、吕伯攸、王剑星、殷叔平、朱亮基编纂：《新主义国语读本》（前期小学第1册），世界书局1931审定，1932年403版，编辑纲要。

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的急促时空中，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的党务工作纲要中，规定国民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复兴民族精神”“唤起民族意识”“御侮自卫，共赴国难”。^①1932年5月，蒋介石发表《革命哲学的重要》，提出：“我们现在要御外侮，救中国，根本的问题，第一就要恢复我们固有的民族性。……中国固有的民族性是什么？从来立国的精神是什么？现在需要的又是什么？总理已经写得很明白，就是‘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唯一的救国主义。”^②1932年10月，教育部公布实施《中小学课程标准》，取消“党义”科，重设“公民”科，各书坊迅速推出“复兴教科书”“新课程标准教科书”“新生活教科书”“开明课本”等。这些教科书不同程度展现三民主义思想，提高整个民族的抗战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鼓舞中华民族共赴国难、抗敌御侮，成为抗战救亡的启蒙利器。

1932年6月，教育部设国立编译馆，拟推出国定本教科书，后因战事等原因暂时没有实施。1938年1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为改变因教科书基地上海沦陷而导致教科书供应短缺的局面，再次强调国定本教科书的编写。1942年5月，蒋介石在写给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信函中建议，“以后凡中小学教科书应一律限期由部自编，并禁止各书局自由编订”。^③1943年，国立编译馆正式推出“国定本”教科书，初级小学有《国语常识》《算术》，高级小学有《公民》《国语》《自然》《地理》《历史》，初级中学有《公民》《国文》《地理》《历史》。

教科书的话语实践本身就是历史文化事件，其对于后世的影响比某些战争更加深远。民国中后期国统区教科书的发展，保证了烽火岁月中教育的薪火相传、弦诵不辍。教科书以三民主义凝聚中华民族人心，充溢着中华民族丰厚的精神气质，深藏着作者的学术智慧和深厚的知识功底，当然也烙刻着国家政治介入教科书的深深印迹。特别是由于教科书从编校到审定，突出“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启蒙学童在心理和行为上

^① 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页。

^② 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载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33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58页。

明确指向“党”，强力进行着意识形态控制和规训，是不利于儿童独立人格和公民素养的形成。特别是个别教科书中有一些反共言论及内容，更不可取。

1927—1949年：根据地教科书以“土地革命” 为宣传的启蒙引领解放中国

从1927年到1934年，中国共产党以中央苏区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提倡平民教育，各乡普遍地设立列宁小学。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①根据地禁止使用基督教书籍、国民党文化书籍和“四书”“五经”等作为教科书，要求各地新编教科书。1930年5月，湘鄂赣边界工农兵暴动委员会编辑出版《红孩儿读本》是“现存最早的一种红色初级小学校的儿童读本”。^②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写《共产儿童读本》6册，根据徐特立的审阅意见修改后付印，是根据地第一套统编通用的小学教科书。这套教科书蕴含大量科学常识、儿童游戏的内容，还采用对比、问答、故事、韵文、歌谣、顺口溜等宣传红军及红色政权。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党中央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③1938年2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科编撰有“初级小学国语6册，初级小学算术6册，初级小学政治常识1册，高级小学历史2册，高级小学地理1册，另有图画1册、劳作1册、唱歌1册”。^④1938年5月，中共胶东特委领导成立“国防教育委员会”编写了国防教育课本，1941年3月国防教育委员会改称国防教材编辑委员会，编写小学、民众、妇女课本。1945年12月，苏皖边区

① 《中共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载《苏维埃中国》第2集，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版，第283页。

② 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编著：《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 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③ 同上书，第127页。

④ 同上书，第135页。

政府教育厅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审室，半年内编有中学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课本和小学数学、政治教材。^①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北、山东、东北、西北、华东等解放区教科书的编撰出版进一步规范与系统。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的”^②，叶圣陶为主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修订一套中小学教科书，基本保证了1949年秋季开学使用。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农民起着保守或者革命的作用，农村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农村的反抗派是致命的，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比田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的田租更为革命，得农村者得天下”。^③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就号召儿童们要“努力共产”“努力革命”。^④1933年《共产儿童读本》明确“分田分了田自己才有田”。^⑤教科书大力宣传跟着共产党进行革命，建立新政权，老百姓就“翻身做主人”。正是教科书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当家做主”的大力宣传，根据地从青少年儿童到普通民众都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洗礼，成为共产党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根据地的农民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正统感，等于是瓦解了当时还是正统国家政权的代表者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根据地农民心目中，蒋委员长的地位已经被毛主席完全取代了。更重要的是，落后、分散而且自治力很强的根据地农村，就此被注入了类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甚至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某种崇拜，如果说在此之前，国家政权的强化与下移，乡村组织还可以而且能够组织抵制的话，那么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可

① 皇甫束玉、宋荐戈、龚守静编著：《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 1927.8—1949.9》，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4页。

②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49年）》，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7页。

④ 《杨贵耀谈话录抄》，载《秋收起义参考资料》，上海教育学院政治系1977年编印，第113页。

⑤ 赣南师范学院、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 1927—1937（7）教材》，1985年，第62页。

能了。”^①可见,根据地教科书既是教育的基础文本,又是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的—场全面深入政治动员的宣传载体,后一个作用在兵戎相见岁月中显得更突出、更重要。

1949—1976 年:新中国教科书以“无产阶级” 为力量的启蒙引领社会主义建设

1949年3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人就向世界发表“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②的宣言。新的东方大国不仅要依靠国家机器镇压各种反抗和扫除各种障碍,更要利用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和教育在思想上、精神上向全体国民灌输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感,强化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教科书因其巨大的启蒙作用而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毛泽东题写社名,新中国教科书在国家意志作用下编写出版迅速统一。1951年教育部提出“必须研究中国参考苏联,以苏联的中学教科书为蓝本,编写完全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新教科书”。^③1953年2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④1954年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以苏联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为蓝本,拟订十二年制中小学教学大纲并编写新教科书,1955年出版,有课本41种97册、教学参考书23种69册,是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科书,开启“一纲一本”的教科书时代。^⑤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出现意见分歧。1956年4月,毛泽东

①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224页。

② 孙鼎重主编,张春国、于占河副主编:《党务工作手册》,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86页。

③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

④ 费正清等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页。

⑤ 吴小鸥、石鸥:《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科书——195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撰出版的教科书研究》,《课程·教材·教法》2010年第10期。

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① 1957年3月在同七省市教育厅厅长谈话中提出：“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和教材是否合适？……教材要减轻，课程要减少，……教材要有地方性，应增加一些地方乡土教材。农业课本要由省编，……初中、高中加政治课、编政治课本。”^②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明确“各地方可因地、因校制宜，对教育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颁发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指导性教学计划、大纲和通用教材、教科书进行修订补充，也可自编教材和教科书”。^③ 这一时期，共有18个省、市和师范学院校编写了部分或整套九年制、十年制中小学新课本。因地方编写教科书存在一些问题，为保证全国必要的统一性和应有水平，教育部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从1960年开始编写十年制及十二年制教科书。1963年，一些地区反映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十二年制教科书内容深、分量重、教学困难等问题。人民教育出版社从1964年开始多次修改十二年制教科书，但未来得及使用。196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要求“教材要彻底改革”。^④ 1966年9月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教科书当作“四旧”被烧。1967年中小学“复课闹革命”后，开始用毛泽东著作当教科书，1968年前后大部分省市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写小学《语文》《算术》《常识》《毛泽东思想课》《革命文艺》等，中学《毛泽东思想教育》《语文》《数学》《工农业基础知识》《革命文艺》《军体》等。1971年后，一些传统学科课程恢复并编写教科书，如《化学》《物理》取代《工业基础知识》。1973年之后，各地教科书也按批林批孔和开门办学的要求改编或重编。

新中国成立后，教科书在强力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过程中，明确“无产阶级”是一个重要符码，教科书频繁出现“长工、翻身、工人、农

①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5页。

② 杨元华、沈济时、陈挥、高平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55年要览（1949—2004）》，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编：《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1959年印，第3页。

④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8页。

民、地主、恶霸、资本家”等身份识别词语，以此划分出“敌我阵营”，明辨是非，而且教科书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国家认知和光明前景，启蒙未来主人建设国家的火热激情。如1954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教科书编辑方针第一条第一句话强调“贯彻社会主义思想”。^①同时，教科书将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人物渐定一尊，甚至极致化为“颂圣”，以达到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认知与情感的统一。由此，教科书发展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品性，教科书没有承载与体现科学知识的完整性和正当性，教科书启蒙没有启迪智慧、润泽生命，教科书甚至在政治旋涡中偏离了现代启蒙的方向。于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达到预设的建设目标，即1963年毛泽东提出的“再有15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②

1977—现在：教科书以“现代化”为追逐的启蒙引领科教兴国

1977年5月，邓小平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知识，有人才。”^③他在《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又强调，“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④并指出：“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⑤教育部决定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小学教科书编辑人员为基本力量，“又从一些大、中、小学选调了一部分优秀教师，一共200人，组成‘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

①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

②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6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8页。

③ 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1页。

④ 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页。

⑤ 同上。

作会议’编写中小学各科教材”。^①这套全国统编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建构全新的科学知识和文化体系，开启教科书启蒙的新篇章。1981年4月，根据邓小平“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开始出版六年制重点中学教科书。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②198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全国通用的六年制小学教科书，为提高教育质量探索实验。

1985年1月，教育部颁布《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198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标志着中小学开始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对教科书提出了新要求。1988年5月，原国家教委召开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规划会议制订《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指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教材，必须在统一基本要求，统一审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教材的多样化，以适应各类地区、各类学校的需要。”“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通过竞争促进教材事业的繁荣和教材质量的提高。鼓励各个地方，以及高等学校，科研单位，有条件的专家、学者、教师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的教育方针和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编写教材。在教材内容的选择和体系的安排上允许有不同的风格和不同的层次。”^③原国家教委规划了“八套半”义务教育教科书，即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面向全国“六三”和“五四”学制各编一套教科书，北京师范大学编写一套“五四”学制教科书，广东省编写一套面向沿海地区教科书，四川省编写一套面向内地和西部地区教科书，河北省编写一套农村小学复式班的教科书（被称为“半套”），八家师范院校联合编写一套要求较高的“六三”学制教科书（未编出），上海编写面向发达城市地区的“六三”学制教科书，浙江省编写面向发达农村地区的“六三”学制教科书。在现代教育思潮与理论指引下，各地实验教科书探索达到20世纪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上最高峰，尤其以语文与数学学科最突出。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迎接21世纪挑战的紧迫时刻，我国启动第八

① 叶立群：《课程教材改革探索》，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② 陈显泗、肖季文、刘长根主编：《邓小平文选（第3卷）词语汇释》，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③ 孙琬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律法规全书》（下卷），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3页。